



中国
写作理论史



中国写作理论史

主 编 刘锡庆
副主编 王志彬 朱宝恒
曹玉梅 蔺茨璧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中国写作理论史

主编 刘锡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6 印张 4 插页 40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7-6419-3386-4/G·2931

定价: 8.45 元

序

刘锡庆

《中国写作理论发展史》经过数年准备，一年撰写，终于摆在了世人面前。

成败优劣应由读者评说和“时间”的检验。

发展轨迹及概貌特征等亦俱在书中，用不着我再饶舌。

我这里只想对各章节难以涉笔、无法细述而又事关总体、牵带规律的一些重要问题“纵笔随心”地写下一点思考，“抛砖引玉”，聊供“参考”耳。

—

中国的写作理论演化到今天，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由先秦至“五四”前夕是漫长而辉煌的“古典”时期；以“五四”为发端至建国以来是崭新而富有生气的“现代”阶段。

“古典”与“现代”不仅仅是时间的、形式层面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差异：

“古典”文化（也包括其写作理论）的整体精神是以“君”为本位，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尊君”、“卫道”、“孝亲”为内容规范，以“文言文”为雅正媒体，以“中和之美”为审美准则，体现了等级、专制政体下炎黄子孙所创造的“农业文明”的赫赫成果。

“现代”文化（也包括其写作理论）的整体精神则与其迥然有别。它以“人”为本位，以开放的“现代意识”为魂魄，以个性的觉醒、阶级与民族的解放及“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以“白话文”为传播中介，以“多样化”（即百花齐放）的艺术追求

为审美至境，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新型政体下华夏人民所开创的“工业文明”（前期）的矫健风姿。

但近代（本书第八章）是过渡期。“过渡”在两个异“质”的分判之间都是往往存在的。“过渡期”的根本特点是新旧相交、起伏动荡。新“质”由滋生而发展，由发展而壮大，不断地鼓荡着滚滚“风雷”；旧“质”由稳固而动摇，由动摇而颓败，不断地失去昔日的声威。

当然，大的“阶段”中还会有相对独立的节奏、“段落”——我们所置之“章”即为它的一种反映。

二

传统文化的“发端”在先秦时期。

这也正是写作理论的“萌芽期”。

当时，总的形势是周室式微，诸侯蜂起，争战连年，刀兵不息；在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情势下，为成就“霸业”，人主纷纷延揽人才、“礼贤下士”，而“处士横议”，以求一用。“士”阶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百家争鸣”也就是这样自然生成。

“儒家”、“道家”本是这“百家”中的两家。包括这些学派的“首创者”孔、孟和老、庄，恐怕当时也不曾料到他们的思想、学说会对后世发生如此深远、重大的影响吧？

儒家讲“仁”重“礼”，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调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尊卑有序，不能相乱，要“克己复礼”，维护等级的“纲常”；同时，又提倡“仁爱”之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妇相和，朋友相亲，调节好人际矛盾，以达到“齐家（这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治国（各诸侯国）、平天下（大一统帝国）”的根本目的。至于“个人”，只是整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链条，应“正心修身”而不可越“礼”失“度”。

道家贵“无”重“道”，比较注重“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谐和。他们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崇奉“自然”、“无为”的思

想主张，力倡“绝圣弃智”、“返朴归真”，遵循着天地、自然之“道”，退回到远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至真境地。他们反对束缚人的天性，主张人应无知无识，无拘无束，放浪形骸，任情尽性。特别是他们许多朴素的认识论、辩证法，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无中生有”、“美言不信”、“见素抱朴”、“致虚守静”、“养神正形”、“得意忘言”等等，在艺术创作上均给后世以极大启示。

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重“社会”的，道家是任“个人”的；儒家看重“秩序”，道家追求“自由”；儒家系伦理化“人生”教义，道家乃艺术化“人性”张扬。

儒、道两家，对峙、分流。沾濡后世，影响深远。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多崇“儒家”绝非偶然，因为它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等级、专制王朝的政治统治。

但“道家”作为一种和“儒家”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不仅常常为统治者所局部吸收、采用，而且往往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思想上的“叛逆者”的精神武器；同时，“士”阶层的双重性格也往往使“道家”精神成为他们失意时“隐居山林”的思想寄托。所以，“盛世”儒家兴，“乱世”道家行；得意时“志在天下”信奉儒术，失意时“浪迹江湖”，依属道家——作为一种自由的寻求和精神的解脱，“道家”常常都是“立德立功”、“兼善天下”的“儒家”的一个重要补充。所谓“儒道对峙”、“儒道互补”即是此意。

“儒”是正统，“儒”、“道”互补就这样渐渐发展衍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后，它们又和天文、历法、医药、纺织、印刷、军事、农桑、文学、艺术等成果汇成一体，逐渐向朝鲜、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辐射，影响深远，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华“文化圈”。

“发端”是走向成熟的起点。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端”

是很伟大的！它的深厚博大、雄浑开阔都足以与古希腊文明相匹敌！

起步于这里的古典写作理论，完全可以认为是起点高、渊源深。

三

中国写作理论的真正“奠基”是在魏晋六朝。

这真是一个辉煌盛大的“奠基”！

魏晋六朝，时值动乱，刚刚取得正统地位的“儒教”受到严重挑战，老、庄行时，谈“玄”大盛。连年的攻伐征战使人们常生“转蓬”“朝露”之感，常带“慷慨”悲凉之气——这种人生的“忧患”体验和“悲凉”感悟，促成了文学创作上“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鲁迅语）崭新境界的确立。与此相应，写作理论的拔地而起也令人刮目相待：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或独出机杼，或体大思精，洋洋乎蔚一时之大观，浩浩乎极一时之鼎盛！

这一切，我认为都还和外来“异质文化”的撞击、激活有很大关系。

魏晋时期，“佛教”已传入中国^①并且很快地蔓延风靡，当时寺院林立，浮图高耸，讲经布道，僧徒甚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佛教源自印度，是东方另一文明发祥地印度文化及智慧的结晶。这是和“中华文化”完全异质的另外一种文化体系。它传入中国后，外来“印度文化”与传统“华夏文化”相击相撞，自然迸射出眩目动心的熠熠光彩。^②

如果说，华夏文化的“发端”即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孔子、老

① 西汉末年佛教即经西域传入中国。

② 由此“释”家兴起，儒、道、释“三教合流”。

子都生活在此期间)的“百家争鸣”和古希腊此时的哲学流派“竞起纷呈”是东西两大文化各自“平行”发展现象的话,那末,在公元后五世纪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文化的审美“自觉”和理论“飞跃”(不仅《文赋》和《文心》是划时代的,而且《诗品》、《画品》、《书品》等在艺术的各方面都进行了开拓、总结)就是东方两大异质文化“交叉融汇”发展的一个辉煌结果!

“异质”文化的拥入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上还有两次,都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引进;一次在“五四”时期,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篇章;一次在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路线打破了封闭自守的陈旧格局,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事实发展的经验表明: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引进、吸收、融化是十分重要的。“同质文化”的渐进发展,往往不如“异质文化”的猛烈撞击、强力震撼更能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大步解放。

从这里“引申”观之:各民族独特文化的发展、交流、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兴盛、光大也是卓有贡献的!它们和“汉文化”虽相近、相通,但亦有差异、区别,象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的入主中原,就明显改变了原有文化的发展路线,带来了一种“清新、蓬勃”之气,同样丰富、光耀了中华文明。

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和经济发展同步。“百家争鸣”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的经济发展就都不行,魏晋也很糟糕,但细考它们的“繁荣”有两条怕是重要的:第一是“思想解放”。没有这一条,绝对办不到。“百家争鸣”时是由于“礼崩乐坏”,“五四”运动时是由于“王纲解纽”,原有思想禁锢打破了,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潮流,新思想才“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生长起来。魏晋时期也是这样,曹氏父子、阮籍、嵇康等就都是不拘成法、脚踏“礼教”的人物。第二是“异质文化”的撞击。魏晋如此,“五四”亦如此。这也许或多或少地可以解释唐代经济繁荣、国势鼎盛,但在写作理论的建树上却并无和“大唐气象”相适应的宏篇

巨制（象《文心雕龙》那样的大著作）出现的一些深层原因吧。

四

我国古典写作理论的“总体”特点前面已有概述（是和整个“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结合而论的），因失之“笼统”，故在此还想做点“具体”分析。

我认为这样五点是比较明显可见的：

一、注重“功利” 儒家崇实尚用，从一开始就把文章写作和经世致用联系起来。“兴、观、群、怨”、“贯道”、“明道”、“宗经”、“征圣”，“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等等，一言以蔽即“文以载道”。这种以“道”为本，以“文”为“具”的思想，固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也在事实上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功绩不可轻抛；但其历史局限性、自身偏狭性也是很显然的，它反映了“文”本质上附庸、桎梏于“道”的微不足道。

二、人、文一体 传统写作理论一向主张“文如其人”。“文”是“人”的外观，“文格”是“人格”的映照。正是在这种“文格”、“人格”统一观的认识下，它才那样强调作者高尚人格、学识、品行、情操等的深厚修养。只有“第一等”襟抱，才能写出“第一等”诗文几乎是不二之论。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优良传统。问题在于：这个“修养”的内容方向是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为主的，这本身就往往会成为一种“无形”的禁锢；同时，过于简单、直线地理解“文”和“人”的复杂、曲折关系，也不免偏颇、片面。古典诗文中比较缺乏深层的心灵矛盾展示和灵魂的自剖、拷问，却多着“君子”和“道学”气，恐怕多少与此有关。

三、“直觉”把握 它讲究“整体”精神的把握（这和西方重“分解”认识不同），“神”、“气”、“韵”、“味”的品评（这和西方重“思辨”逻辑不同）。实际上是倚重“直感”、强调“体验”、讲求“领悟”，更相信在艺术审美范畴里的直接“感受”和“经验”，

更推崇那种积淀着理性精神的感性“直觉”。在妙微精深的艺术创作领域，面对着如此幽远玄奥的精神魅力问题，古圣先贤们的这种“直观顿悟”的直觉性思维方式^①是对头的，这种“勾神摄魄”的意会性描述手段也是高明的。这就形成了一整套独特、奥秘而又深邃、切用的文论术语，诸如“道”、“意”、“志”、“情”、“文”、“辞”、“境”、“象”、“风”、“骨”、“机”、“势”、“气”、“韵”、“虚静”、“空灵”等等，全面展示了神秘精妙的“东方智慧”！在写作理论的研究、探索上，我认为：中国这个“文章大国”所达到的水准、层次是西方以及其它各国都很难与之比肩的！一部《文心雕龙》，集文学创作、文章写作、作家修养、文学批评、文体研究等之大成，实乃一部古典写作理论的“百科全书”！而它成书的年代西方才刚刚跨入“中世纪”的门槛。

当然，这种在“混沌哲学”启示下所形成的文论术语，由于它蕴涵的“深层”哲学意味带有“神秘性”特点；“中层”情意内容带有“抽象性”特点；“表层”语言符码带有“模糊性”特点（这是和“汉语”的形象表意、词性不定、多义模糊等特性密切相关的）的关系，因而离开了大的文化背景和氛围（比如译介到国外）就比较难懂、难用，同时，由于历史和哲学等的局限，它并非索解、领悟了全部写作的深层奥秘，反而在其中烙上了不少唯心、玄虚的印记，因此，在此驻足不前也是不正确的。

四、“辩证”思维 古典写作理论充满了“艺术辩证法”——这是它对于今天最可宝贵的奉献。我觉得这也正是它最有价值的艺术“精髓”。

思想、内容层次如“道”和“文”的关系，“神”和“形”的关系，“情”和“辞”的关系，“意”和“材”的关系等，它有所侧重，在坚持“重点论”的同时（一般是前者）也不忽视后者。总的说是处置得当的。

① 这种思维方式儒、道、释三家大同小异，其中“道”家色彩尤甚。

艺术、技巧层次如“虚”与“实”，“刚”与“柔”，“张”与“弛”，“繁”与“简”，“急”与“缓”，“隐”与“显”，“擒”与“纵”，“起”与“伏”，“疏”与“密”，“奇”与“正”，“宾”与“主”，“粗”与“细”，“点”与“面”等等，就辩证分析、具体对待、灵活运用，“化”而不“定”了。这部分内容很少片面性，最见精彩。一直到今天它仍闪烁着不灭的灵光。

古代没有现今的“系统论”科学，但在这些两相对立的技巧论述中潜含着“系统”思想，“全方位”、“多侧面”观照的精神，实属不易。

五、“和”、“美”意识 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为美并非偶然，它反映并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思想模式”。他们不狂暴、激烈，不遐想、纵情，贵悟性、轻逻辑，信而好古、敏而多学，视既定秩序的“稳定和谐”为珍贵，以摒除“两端”的“中庸之道”为妥善。这一切投射在诗文写作和审美、批评领域就表现为“和”、“美”意识的弥漫。追求“首尾圆通”，讲究“启、承、转、合”，提倡“温柔敦厚”风格，酷好“皆大欢喜”结局。特别是“大团圆”的收束方式，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的“和”、“美”心理定势：“善”终究会降伏“恶”，“美”必定会胜过“丑”，烟云散尽，复归于“和”，以报还报，毫厘不爽。鲁迅对这种求“全”贵“圆”的民族心理（如“十景”病、“团圆”梦）多所批评，他认为读中国书往往使人“沉静”平和，与“实人生”远离，确为不刊之论。

“和”、“美”意识无疑是狭隘、偏颇的。古典文化中之所以比较缺乏矛盾冲突尖锐剧烈、起伏开合动魄惊心的“怒吼”式、“自拷”式作品，比较缺乏崇高的“悲剧精神”，比较缺少歌哭“叛徒”、肯定“冒险”的创新“出格”之作，不能说不与此有关。

古典写作理论的“特点”，以上五方面涵盖肯定不全面、不完备，但我的“本意”并不在此（这也是我力所不胜的难题）而是只想表明：“传统”——既往文化的“积淀”的体现——它既有

“精华”也有“糟粕”，既存“优质”也含“劣汰”，但否定、割断传统是既不明智也不可能的；正确的做法只能是选优裁汰、取精弃粗，在其基础上造成“现代”的新质。“现代”写作学的“根基”正需要从这里清理、奠定。

五

“五四”之后即拉开了“现代”写作理论建设的序幕。

但回顾当时文化战线的整体发展风貌即能发现：创作上突破很大；思想理论斗争异常激烈；写作理论建构方面（特别是系统、严谨的学术性著作）却进展迟缓。

这是因为：一，“五四”狂飙突起给旧文化以致命一击，但强大而顽固的旧营垒很快进行反扑，和新、旧军阀结成一体对新文化实行“围剿”，使志士仁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治斗争而不能全力进行文化建设；二，阶级、民族斗争异常剧烈，“血与火”替代了“笔与舌”，时代的变动不居和生活的动荡不宁使理论、学术的建设退为次要地位；三，大多数“文人学士”（知识分子）面对着离奇变幻、思潮迭起的斗争现实，把握不住“人生”航向，寻找不到“自我”位置，无法取得稳定、平衡的写作心态。

总之，建国前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政权”不在人民手里。在压迫惨烈、苦难深重的情势下，革命政党和人民大众最头等、最迫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赢得胜利。其它一切，均在其次。

尽管如此，现代写作史上的两个人物——鲁迅和毛泽东的影响仍是深重久远的。鲁迅是“一代宗师”，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魂”！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创作的众多领域力拓新路，在理论的广阔天地破旧立新，虽无意于“写作”指导，也最鄙弃作文“秘诀”，但总观其写作论述仍烛照幽深，自成体系，流光溢彩，震聋发聩！说他是新文学的“开山祖”，现代文化的“鲁圣人”，一

点不错。毛泽东也是“一代豪杰”，严格意义上的“风流人物”！他贯通马列，深谙国情，娴熟地运用“实践论”于道路探索之中，灵活地化解“矛盾论”于斗争策略之内。他是文章高手，“整风”三论、五评“白皮书”及《讲话》等，影响所及，逾越半个世纪！当代文风——特别是政治、说理、演说、论辩，包括书面文件、日常谈话等等，其遣辞造句、语势文气等莫不深受他的著作薰染。尽管其功过尚须具体分析，但仅以“影响”而论，我认为至今尚无出于其右者！

建国以后，本应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由于理论指导上、实际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运动频繁，斗争不断，导致了十年“文革”的浩劫。新时期以来，在“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指导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百业俱兴，万象争荣，现代写作学的理论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我在此诚挚申明：“现代”、“当代”两章，由于相关资料、研究成果的积累、搜集欠充分；各种思潮、理论的沉积和筛选亦不够；有些情况“表述”起来也较为复杂、困难；同时，我们编著者本身学术素养、观照视野、理论水平亦多有局限，因此，它是很粗疏、不成熟的。筚路蓝缕的“草创”，实乃为着“美玉”问世！

六

在着手本书写作之前，我们华北地区写作界部分同仁编撰了《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分册）和《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五本系列丛书（俱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中国写作理论发展史》的成书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孕育、“升华”起来的。

据我们所知，它还是此类著述的“第一部”，是填补“空白”

之作。

我们期待着关注与批评！

我们更期待着超越与“成熟”！！

1992年3月草于北师大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写作理论的发端与奠基

- 第一节 概述..... (1)
- 第二节 儒家写作观的提出及对后世的影响..... (9)
- 第三节 道家写作观的提出及对后世的影响 (16)
- 第四节 墨家、法家的写作理论 (21)
- 第五节 写作教育 (25)

第二章 两汉时期写作理论的初步拓展

- 第一节 概述 (28)
- 第二节 《毛诗序》对“诗言志”的发挥
及“六义”的提出 (34)
- 第三节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史记》
的“《春秋》义法” (40)
- 第四节 王充《论衡》中所表现出的写作观念 (46)
- 第五节 扬雄、班固论赋及其写作理论 (51)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写作理论体系的建构

- 第一节 概述 (58)
- 第二节 曹丕对作家个性、写作地位及文体
意识的自觉强调 (61)
- 第三节 陆机《文赋》对“物——意——言”
创作论的探索 (67)
- 第四节 挚虞、任昉的写作理论 (71)
- 第五节 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对汉语

	写作的重要贡献	(77)
第六节	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写作 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82)
第七节	肖统《文选》的选文标准及文体分类	(89)
第八节	钟嵘的《诗品》	(93)
第九节	《颜氏家训》的写作教育理论	(98)

第四章 隋唐诗文写作理论的新发展

第一节	概述	(104)
第二节	刘知几《史通》的写作观念	(107)
第三节	杜甫、白居易论诗歌写作	(115)
第四节	韩愈、柳宗元在“复古”旗帜 下的古文写作理论	(123)
第五节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诗歌写作 风格的论述	(131)

第五章 宋金词文写作理论的革新

第一节	概述	(140)
第二节	一代宗师欧阳修的诗文写作理论	(146)
第三节	“三苏”的散文写作理论	(153)
第四节	姜夔、严羽的诗歌写作理论	(162)
第五节	李清照、辛弃疾论词的写作	(170)
第六节	王若虚、元好问的写作理论	(177)
第七节	《文则》和《文章精义》	(185)

第六章 元明——儒道写作理论的尖锐对峙时期

第一节	概述	(190)
第二节	元代土壤萌出的幼芽——戏曲小说 写作理论	(197)

第三节	宋濂、陈献章等儒道对峙的理论特色·····	(201)
第四节	复古思潮中的清新气息——诗的 审美意境的倡导·····	(206)
第五节	高举反复古旗帜的勇士——李贽·····	(211)
第六节	王骥德、叶昼对戏曲、小说理论的发展·····	(217)
第七节	适应政治斗争需要的书院写作教育 及写作本体研究的深入·····	(223)

第七章 清代——写作理论的集成时期

第一节	概述·····	(229)
第二节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倡导 的“忧世愤时”说·····	(236)
第三节	异彩纷呈的文论集成体现者—— 魏禧、桐城派、章学诚·····	(242)
第四节	诗歌作者的修养论——叶燮的 “才、胆、识、力”说·····	(248)
第五节	闪耀主体精神的诗论奠基者——袁枚·····	(252)
第六节	金圣叹等对小说技法的系统总结·····	(258)
第七节	《闲情偶寄》——一部关于戏曲理论和 表演技巧的鸿篇巨制·····	(264)
第八节	蒙学教育的作文训练和书院 教育的八股文风·····	(270)

第八章 清末民初的写作理论

第一节	概述·····	(274)
第二节	包世臣、刘熙载的综合性写作理论著作·····	(280)
第三节	洪仁环、曾国藩的散文写作理论和 八股文的衰亡·····	(288)
第四节	林纾、吴曾祺的散文写作理论	